

D851.29
10

俄罗斯与欧洲 关系研究

毕洪业◎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011001-1

俄罗斯与欧洲 关系研究

毕洪业◎著



ELL0S1YU0UZH0UGUANX1YAN.J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研究/毕洪业著. —北京:中
央编译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80211-931-4

I. 俄… II. 毕… III. ①国际关系史—研究—俄罗斯、欧洲—近代
②国际关系史—研究—俄罗斯、欧洲—现代 IV. D851.29 D8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9164 号

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研究

出 版 人: 和 葵
作 者: 毕洪业
责任编辑: 曲建文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3(编辑室)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66509618



前 言

冷战结束后，欧洲政治格局再次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欧盟抓住时机成功实现了历史性的扩大，而俄罗斯在内部转型的同时也就对外战略作出了全面的调整。在这种调整中，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定位和发展，无论对于欧洲大陆新安全体系的构建，还是对于俄罗斯的内部转型，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欧洲大陆历经了太多的战争灾难，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大规模的战争都与之密切相关。所以，几个世纪以来，很多政治家、思想家及社会人士不断提出使欧洲国家间消除战争、走向联合的设想。尽管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了欧洲联合的重要性，但由于这些思想与欧洲国家追求绝对无条件的国家主权的政治现实相去甚远，而不可能实际推行。相反，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宣扬的国际社会天然无政府状态的观点，在欧洲国家中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只是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后，欧洲才深刻认识到联合的重要意义。

就俄罗斯国家的发展轨迹而言，其横跨欧亚两大洲的地理位置和有别于西方的独特历史文化，促使俄国的思想家一代一代地以国家方

向和目标这一基本问题来烦扰自己。从起源上说,俄国是东罗马帝国和保加利亚之东正教文明的“卫星文明”,而后他又成为西方文明的“卫星文明”,但其成就却在很多方面超过了东正教文明,正是在这个文明影响下俄国才使自己的文化跃出先前未开化的阶段。^①马克思也指出:“君士坦丁堡是东西方之间的一道金桥,西方文明好比太阳,不经过这道桥就不能照亮世界,而不同俄国进行斗争就不能通过这道桥。”^②在历史上,俄国与欧洲(这里主要指西欧)的关系通常一直是被动地接受。“只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里,俄国才能报答西方,先是报答以俄国伟大的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以后又报答以由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产生的经济计划技术和社会促进手段。但是,20世纪以前,欧洲对俄国的影响比俄国对欧洲的影响大得多,而且这种影响一直是俄国发展中的一个主要因素。”^③从接受分裂于西欧的拜占庭基督教到彼得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再到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伟大实践,都能清晰地看到欧洲对俄国的影响。但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俄国不仅没有成为像西欧那样的天主教国家,反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东方东正教文明。随着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占领,以及俄罗斯人摆脱蒙古人的统治,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更多地显露出与西欧天主教文明的不同。这两种文明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种区别最明显的表现于教会和世俗政权的关系上:西方教会是普照尘世的太阳,是一个超然于世俗政权的独立特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机构,但是东方正教的教会却是追随于王权的阴影。同时,俄罗斯的东正教还承袭了拜占庭式的“帝国崇拜”观念,从自身发展出发提出了所谓莫斯科——“第

①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1995年,第263页。

③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页。

三罗马”理论。^①有人甚至认为俄罗斯文明患了“政教合一的综合症”。^②另一方面，东正教强调自身的唯一正统性地位，并顽固坚持一成不变的教义立场，认为自己的任务是传承而不是发现真理。在俄国接受基督教洗礼900周年（1888年）之际，以俄国主教尼古拉为首的俄日差会为其母教会感谢信的结尾中写道：“只有东正教才能把上帝的话那甜蜜的源泉供给那来到东正教面前的人饮用，因为只有东正教保有了它所接受的神圣教义，并且将保持不变，直到一切时代终结，决不作些微的增加或删减，因为它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上帝的灵长驻在它体内，保护它不犯错误。”^③由此，与西欧天主教不同，在俄国没有教会学院和教会大学。俄国的知识分子大都只能称之为信徒，而许多研究的目的也在于使传统的理论永存和防止异端者，真正有独特见地的宗教思想家十分罕见。当然，著名的宗教哲学家阿·霍米亚科夫（А. С. Хомяков）和弗·索洛维约夫（В. С. Соловьев）等人是极为个别的例外。在俄罗斯人看来，莫斯科不仅不是统一的基督天主教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完全有别于罗马的基督教世界，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真正基督教——东正教的象征，其使命是保有它真正唯一没有被异教徒玷污的基督教精神并拯救“异教”的欧洲。所以，俄国作为一个帝国的对外扩张和干预性政策是天经地义的。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地扎根于民族意识之中，几乎从来没有引起俄国人的怀疑。这一点在俄罗斯与天主教波兰的关系中得到充分地体现。在1830年和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之后，俄罗斯社会各界都一致支持对起义参加者施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和丘切夫等人，对致力于脱离俄国统治的波兰人的勇敢精

① 参见冯绍雷：《俄罗斯—东西方结合部的文明》，载资中筠主编：《冷眼向洋》（下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6页。

② Большаков В. И. Грани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 М. : Москва, 1999. — С. 3—25.

③ [俄] 赫克：《俄国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骅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1页。

神都公开表示切齿痛恨。^① 另外,不可否认,蒙古鞑靼对俄罗斯长达两个半世纪统治的影响。这一点在欧亚主义者那里得到足够的重视。著名的欧亚主义者古米廖夫(Л. Н. Гумилёв)强调,“与罗马专制政体和教皇对俄国的影响而言,蒙古鞑靼统治的意义毫不逊色:它不是表现在文化上,而是无处不在地体现在风俗习惯上。”^② 在谈到文化的落后性时,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В. О. Ключевский)写道:“千年来和草原上凶恶的亚洲人敌对的邻居关系,仅这一点在俄国的历史生活中已足以超过欧洲的全部缺点。”^③ 而俄罗斯与西方的接近又几乎完全是实用主义的,其更感兴趣的是西方的军事技术,而在政治制度上则一直维持着以沙皇个人专权为中心的君主专制政体。正是“彼得时期对社会关系、政治制度及行政机关的根本性改革,最终使俄国的专制制度得以确立”^④。恰恰是主张西化的彼得一世最终完成了俄国政治制度从等级代表君主制到君主专制的过渡,成为君主专制制度的缔造者,并把莫斯科国家改造成俄罗斯帝国。

由于文明的差异等原因,俄罗斯在历史上一直把西欧作为自己的对手或者“拯救”的对象,当然西欧国家也极力排斥俄国并视之为自己的主要威胁。彼得一世前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俄罗斯只能是徘徊在欧洲体系的边缘。但从18世纪初叶起,俄国作为一个欧洲国家,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参与国。同时,俄罗斯统治者花了整整18世纪的一个世纪来向西欧学习先进的技术,并最终成为国际体系的主角,甚至成为维也纳体系的最主要缔造者之一。进入19世纪,其他欧洲国家已经开始放弃专制王权,而俄罗斯仍然极力维持落后的沙皇

① 参见[美]汤普逊:《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杨德友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1-264。

② Гумилёв Л. Н. Древняя Русь и Великая Степь. —М.: политика, 1989. —С. 466.

③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张草纫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1-62页。

④ Коваленко В. И., Медушевский А. Н., Мощелков Е. Н.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1996. —С. 146.

专制政体和已经过时的国际体系。但这时的俄国已是力不从心，很快在维也纳和会 50 年后的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失败。随着对欧洲事务的卷入，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启蒙运动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继传入俄国国内，引起贵族知识分子阶层有关欧洲问题的大辩论和内部不同派别的分裂，进而对沙皇专制政权的统治形成威胁。到 19 世纪末，就连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保守君主政权都开始容忍新生力量的存在，而俄国的统治者仍试图使其他国家的行动能够围绕自己的国内统治制度展开。沙俄反动的政治制度不仅导致它在外交政策上越来越偏离欧洲其他列强的目标，而且还把国际上的趋势看作是国内威胁的延续。因为“在沙俄眼里，别的国家和别的政治运动，不仅它们的所作所为构成威胁，连它们的存在本身也构成威胁”^①。俄国最终没能顶住西方近代思想的冲击，源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在落后的俄国进行了长达 70 多年的伟大实践，尽管在西欧发达国家没有实现。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很快把社会民主政治以及非布尔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派排除掉，在政治领域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声音，这种状况几乎一直延续到苏联的解体为止。

从一般的观点看来，俄国基本上是一个欧洲国家，虽然其历史背景与西边的邻国有所不同。由于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之间在神学上发生的争执，俄国基督教与西方基督教最终分道扬镳，但双方之间的分歧同基督教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之间的分歧相比还是要小得多。所以，关于俄国欧洲身份的争论一直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重要话题。近二百年是俄国针对欧洲问题辩论的主要时期，这种划分是以 18 世纪末西欧的两次革命为界限：法国大革命开创了关于国家和公民的新观念，而工业革命则为人类提供了关于人类、社会和国家的新一轮激烈辩论。

^① [美] 罗伯特·莱格沃尔德：《三个俄罗斯：衰落、革命与复兴》，参见 [美] 罗伯特·帕斯特编：《世界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胡利平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60 页。

而与此同时，俄国也已经成长为欧洲的一个主角，并深深地卷入到欧洲大陆的事务之中。

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有关欧洲问题的讨论重新热烈起来。今天的俄罗斯正经历着技术和结构层面向西方模式的转型。对于欧洲的市场经济、多党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成就，俄罗斯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样的速度采纳和消化这些历史应验，是当前俄罗斯国家定位中的重要问题。转型初期，西方化政策的失败，使整个国家和社会处于危机和分裂之中，俄罗斯急需寻找自身发展的新道路和构建具有社会凝聚力的新思想。在这种背景下，俄国近代思想家、哲学家的著作纷纷再版，并引起广泛的社会共鸣。当前，对俄罗斯文明的研究中，公认的做法是：从俄国最基本的地理气候特征、地缘政治、历史变迁过程和国际社会背景等方面入手，把抽象的俄罗斯文明概念具体化为一个个实际问题，确定俄罗斯文明的疆域、发掘俄国人是怎样不断重构俄罗斯文明的。^①我国学者基本上是从东正教、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特的村社制度等方面来论述俄罗斯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明。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如丘吉尔、基辛格、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在承认由于地理位置、东正教、鞑靼统治等原因使俄罗斯具有不同于西欧基督教文明的同时，更加强调俄罗斯民族的专制传统和帝国野心，甚至持有一种蔑视心理，认为“俄罗斯人习惯于呆在精神病院里，并不是因为有铁窗和囚牢关住他们，而是因为他们里边具有一种安全感、秩序感和权威感，能享受到苏维埃政权赐予的类似沙皇和超级大国式的特权”^②。在西方，也有人认为俄罗斯通过抗击蒙古鞑

① Ильин В. В., Ахиезер А. С. Россий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содержание, границы, возможности. — М., 2000.

② 参见〔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鞭的进攻从而拯救了西方文明，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打败纳粹德国而拯救了世界一样。^①而本书作者的研究视角是，在承认俄罗斯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东正教——斯拉夫文明的基础上，结合欧洲历史发展带给俄国的影响，来分析和阐述俄罗斯社会对欧洲的不同反响。

纵观俄罗斯国家的对外关系史，走过的是一条从国际体系的边缘到中心的历史发展轨迹。随着冷战的终结，俄罗斯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下降，在一定意义上又回到了原点，莫斯科需要重新考虑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问题。在后冷战时期，欧洲大陆地缘政治的变化主要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方面是，面对中东欧地区复杂的形势，欧盟和北约在短暂犹豫后相继出台东扩战略，相对而言，欧盟东扩对欧洲大陆的影响要更加深远；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加入西方文明大家庭的政策，但由于欧盟和北约东扩明确将其排除在外，这促使莫斯科不得不重新定位和调整与这两大最具影响力的区域性组织的关系。出于经济、安全利益等方面的考虑，欧盟不愿意看到历史的倒退，在自己的旁边出现一个仇视外界、敌视西方的俄罗斯，而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俄罗斯变得更加温和、更容易为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所接受。俄罗斯渴望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其与欧盟关系的发展无论对内部经济转轨和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本书的主旨在于，通过分析俄罗斯文化传统中的欧洲认知和双边关系中存在的现实影响因素，对俄罗斯与欧洲关系的演变和发展进行研究，并进一步探讨未来欧洲大陆安全体系的构建问题。这种以历史文化和国家利益为线索的多视角研究，无疑对认识俄罗斯这个“谜”一样的民族和国家的发展走向是能够有所裨益的。

毕洪业 2008年11月

^① John M. Thompson,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Westview Press, 1990. P. 32 - 34.

目 录

第一章 欧洲认知的形成	1
一 欧洲认知的初步形成	2
二 启动“西化”和加入欧洲国际体系	10
第二章 欧洲认知上的对立和分化	18
一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18
二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在欧洲认知上的对立	25
三 欧洲认知上的立场分化	35
第三章 苏联时期的欧洲认知	53
一 十月革命时期的欧洲认知	53
二 斯大林时期有关欧洲的立场	67
三 冷战背景下的欧洲认知	80
四 改革时期欧洲认知的转变	89

第四章 国家走向的争论与对外政策的调整	94
一 东方还是西方?——俄罗斯国家走向的争论	94
二 转型以来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构想	109
三 普京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全方位、多极平衡外交	119
第五章 俄欧伙伴关系的确立	125
一 伙伴与合作关系的确立	125
二 俄欧关系的曲折发展	130
第六章 政治对话机制的构建	136
一 多层次对话机制的构建	137
二 对话机制的调整与完善	140
第七章 能源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144
一 能源对话机制的启动	145
二 能源对话的主要议题及成果	146
三 能源对话中的主要分歧	153
第八章 安全对话与合作	161
一 作为安全实体的欧盟	162
二 俄罗斯对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态度	170
三 安全对话与合作实绩	175
四 安全对话与合作的影响因素	179
第九章 欧盟东扩与俄欧关系	183
一 欧盟东扩的战略选择	184



二 俄罗斯的立场与选择	197
第十章 俄欧关系的未来	212
一 欧盟的发展前景	212
二 俄欧关系与“大欧洲”设想	219
参考文献	257
后 记	270



第一章 欧洲认知的形成

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如果说历史上的俄罗斯在东方所追求的是领土扩张，那么在西方，它除与列强展开对抗外，还致力于文明的融合，尽管它可能永远也不能实现这一愿望。从历史上看，俄罗斯经历了六个发展时期：基辅罗斯、蒙古鞑靼帝国、莫斯科公国、沙皇俄国、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和今天的俄罗斯联邦。这其中俄罗斯经历了五次社会文化重建：吸收拜占庭文化、蒙古鞑靼文化的影响、彼得一世向西方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俄罗斯重新进行文化定位。在这些文化重建过程中，除了蒙古鞑靼统治时期外，俄罗斯的“西化”过程是确定的。可以不夸张地说，“西化”是俄罗斯社会发展的主线。恰达耶夫（П. Я. Чадаев）早在19世纪初就指出：“俄国渴望与西方的欧洲交往已有300年了；300年来，俄国已从那里获得最重要的思想、最富有成效的学说和最生动的、令人爱好的事物。”^①

^① 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74页。

一 欧洲认知的初步形成

就东斯拉夫人国家的形成而言,根据古罗斯编年史《往年纪事》(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的有关记载而形成并基本得到认可的诺曼说认为,古罗斯国家是由诺曼人(Норманны),也即从斯堪的纳维亚来的瓦良格人(Варяги)留里克(Рюрик)兄弟3人于862年率兵夺取诺夫哥罗德大公之位,建立了第一个罗斯国家,从而开始了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留里克王朝(862—1598年)。^①留里克王朝的第二任王公奥列格(Олег)于882年攻占基辅,建立了具有封建性质的基辅罗斯国家,他随后征服了周边各部落公国,最终形成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的国家。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早期东斯拉夫人所信仰的多神教不利于基辅罗斯大公、贵族的统治和罗斯国家的统一。而由于地理上的原因,拜占庭帝国的悠久历史、宗教和文化自然成为基辅罗斯大公所仰慕的对象。早在基辅罗斯建国前,基督教传教士就已经不断在东斯拉夫各部落讲经传道,而基辅罗斯的基督教化过程也从公元9世纪的60、70年代就开始了。据文字记载,自公元863年始,西里尔(St. Cyril)和麦托丢(St. Methodius)到斯拉夫地区传教,并很快有两批武士和商人接受了基督教。这一时期,继捷克之后,波兰于966年接受了基督(天主)教,而东方是穆斯林诸国和拜占庭基督教帝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罗斯大公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 978 -

^① 古罗斯国家形成的诺曼说,最早是在18世纪上半期,由先后在俄国圣彼得堡科学院工作的德国历史学家Г.З.巴耶尔(1694—1738年)和Г.Ф.米勒尔(1705—1783年)根据古罗斯编年史的相关记载提出并确立起来的。但俄国著名的科学家М.В.罗蒙诺索夫(1711—1765年)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坚决反对这种观点,这样,从18世纪中期起形成了诺曼派和反诺曼派之间的长期论战。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诺曼说在西方和俄国国内都占主导地位,但随着冷战以来因被苏联赋予意识形态色彩而使学术价值下降。



1015年)于988年发布诏令,强制其臣民接受基督教洗礼,从而被纳入统一的欧洲基督教文化之中。但罗斯所接受的是10世纪和11世纪的拜占庭基督教形式,也即所谓的东方正教——东正教。众所周知,自1054年基督教发生东西教会分裂,欧洲文化就已经正式形成西方罗马天主教文化和东方拜占庭东正教文化两部分。而且自9世纪开始,拥有最高教会权力职位的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已是名不副实,因为他们要由世俗政权来任免和领导,最终形成的是一种拜占庭教会——国家体制。皈依基督教,不仅标志着当时东斯拉夫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且,基督教在团结东斯拉夫各公国力量,最终摆脱蒙古鞑靼统治赢得国家独立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俄罗斯通过拜占庭获得了宗教、法律、艺术,以及独特的弥赛亚信念,从而形成了自己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救世主”式的世界观。

俄罗斯教会忠于拜占庭的东正教牧首,接受其委派的希腊人为大主教。就俄罗斯的基督教化而言,在弗拉基米尔大公从拜占庭接受基督教时,国内居民信奉多神教,起码在蒙古入侵以前,多数古罗斯人仍然信奉多神教,只有一小部分王公、贵族和商人接受基督教信仰,而且当时所有大主教和大部分主教都是希腊人。^①自从蒙古鞑靼入侵以后,罗斯教会同君士坦丁堡牧首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不断选举俄罗斯人担任大主教,但遭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拒绝。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尽管俄罗斯人同其他的基督教世界联系甚少,但他们从来没有断绝联系。在雅罗斯拉夫(Ярослав)大公统治时期(1019-1054年),不仅基辅罗斯的西部边界一度推进到波罗的海沿岸,使其成为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而且还同法兰西、挪威、匈牙利王室形成姻亲关系。但由于雅罗斯拉夫大公推行分封统治,到

^① 只是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后,到16世纪初,多神教的罗斯转变为“神圣罗斯”(Святая Русь),而外来宗教成为民族宗教,包括农民在内的俄罗斯人都称自己为“基督徒”或“东正教徒”。

12 世纪时，基辅罗斯实际上已经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小公国。同时，日尔曼人的“条顿骑士团”等武装组织以及立陶宛多次对其西北部的领土进行突击，并占领了一些小的公国。由于各公国王公贵族的内部纷争，基辅罗斯根本无力抵抗南部蒙古鞑靼的进犯，蒙古军队最终于 1240 年攻陷基辅，自此东斯拉夫各族进入蒙古金帐汗国（也称钦察汗国）近两个半世纪的统治时期。

13 世纪上半叶，在伊凡·卡里达（Иван Калита，1325 - 1340 年在位，史称伊凡一世）统治时期，莫斯科公国开始崛起。卡里达通过种种手段，不仅使俄罗斯希腊正教大主教公署从基辅迁到莫斯科，而且还从金帐汗国获得了“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封号。借助东正教会强有力的精神支持和利用代理金帐汗国征收全罗斯贡赋的有利条件，莫斯科公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上升，领土不断扩大，很快成为全罗斯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公国。

15 世纪上半期，拜占庭逐渐受到非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压力日益增大，整个基督教世界面临穆斯林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挑战。1438 - 1439 年的佛罗伦萨宗教会议，目的就是增强基督教世界的力量。在此次旨在克服东西教界分裂的努力中，拜占庭人得到了来自于莫斯科代表们的支持，由拜占庭牧首所选派的希腊籍的基辅及全罗斯大主教伊西多尔（Isidore）是会议的重要发起人之一，他还签署了联合决议。君士坦丁堡牧首同意在佛罗伦萨达成的关于东、西教会联合的决议。由于伊西多尔的泛宗教主义思想与莫斯科创建国家的利益相抵触，所以，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二世（Василий II，1425 - 1462 年）对“合并”持反对态度。当伊西多尔于 1441 年以罗马枢机主教的身分回到莫斯科时，遭到教会和国家的拒绝，在罢免了伊西多尔并将其逮捕入狱后，宣布由俄罗斯人的梁赞主教任大主教。这样，由于东方教会的反对，东、西教会之间的联合未能获得成功。佛罗伦萨宗教会议妥协失败后，拜占庭与西方罗马彻底分裂。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占